

# 家庭与社会变迁

## ——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

张永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史研究成了西方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在方法论上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把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尤其是研究家庭演变与近现代社会形成的关系,从家庭变革的内部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一些理论模式和研究流派,如“生命进程”论、“家庭策略”、“原始工业化”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家庭史学建设不无参考价值。

作者:张永健,男,1962年生,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直到本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学家的论著仍然较少涉及历史内容。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可隔绝性。“历史社会学”的先驱们,如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等人开始了新的尝试。<sup>①</sup>从此以后,社会学家谈及社会的历史沿革和历史学家谈论现实问题,都已不是新鲜事。家庭史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社会与历史现象,成为各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成果斐然。这一学术动态和现象值得我们中国社会学和历史学界的同仁们关注。

### 一、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总趋势

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奠基于60年代兴起的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和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两个领域,前者以探讨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及变化为主,后者则以下层人民的社会日常生活及其结构为主题,20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内部流派纷呈的交叉学科领域。8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撰文认为,当代家庭史研究涉及人口、家庭结构、家庭经济、家族血缘亲属关系、宗教、价值观念与情感、性等问题,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五个分支领域。<sup>②</sup>美国当代著名家庭史学家、《家庭史杂志》创刊人之一(该杂志创刊于1976年秋,全名为《家庭史杂志:亲属、家庭和人口研究》)哈芮文认为,当代西方家

<sup>①</sup> Charles Tilly, ed.: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e Fertility",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16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sup>②</sup> Lawrence Stone: "Family History in the 1980s", in "The New History in the 1980s and Beyond",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庭史研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sup>①</sup>的确,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发展迅速、变化剧烈,与20多年前相比有三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更新研究方法,强调各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方法的交叉研究。哈芮文于70年代初在《交叉学科史杂志》上撰写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的家庭史》一文,大力提倡交叉学科研究。<sup>②</sup>他们用社会学原理分析历史上的家庭,再把历史上的家庭演变与近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变迁结合起来考察。20多年来,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方法上的更新。

第二、深化研究内容。从以历史人口学为基础,对家庭人口与家庭规模的量化分析逐渐深入到对家庭成员个人经历、家庭与亲属网、家庭与基本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寻求家庭变化的内在动因;从把家庭看作一个受社会变迁影响的被动客体到把它看作社会变迁的主体,从探讨工业化对家庭的影响到探讨家庭对工业化的影响。总之,是把家庭史的研究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联系起来,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立足于现实研究家庭的演变。<sup>③</sup>

第三、扩大研究范围。当代西方家庭学家或为验证他们以西欧、北美为考察对象而得出的家庭理论模式,或为了反驳这些模式,家庭史的研究由欧美逐渐扩大范围。从时间上,他们上溯到古希腊、罗马人的家庭;从地域上,扩大到东欧、南欧、地中海地区、日本以及中国的家庭史的研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探讨家庭发展的个性与共性。其中关于中国的家庭研究是西方家庭史学中的一个大的领域。西方人对中国家庭及家族制度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主要是一批人类学家。早期家庭学者没能充分地分析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尤其缺乏历史的方法,因而对家庭的发展问题注意不够,不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家庭,而只能从家庭的自然分解与组合过程中作出解释。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把中国家庭制度纳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考察范围中进行研究,大多出现于六、七十年代之后。A.P.沃尔夫等人合编的《中国的婚姻与入嗣关系,1845—1945》、B.帕斯特奈克的《龙中的客人:1845—1945年中国地区的社会人口学》和《1916—1945年台湾地区的初婚年龄》、P.埃伯雷的《宋代中国的妾》和《南宋上层阶级亲属制度中的妇女》、哈芮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研究的思考》等,都对这一时期家庭史研究的动向有所反映。<sup>④</sup>

下面就西方家庭史研究中几个大的变化再作评述。

## 二、从家户规模的分析到“生命进程”理论

60年代之前的西方家庭史学受传统社会学观点的影响,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形式是大家庭,通常是多代合居,而现代家庭则是核心家庭,以限制家庭规模、控制孩子密度、人口流动为特征。60年代以后的家庭史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6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的是以历史人口学派为代表的对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研究,尤以

① Tamara K. Hareven: "Family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以下简称 JFH); 12(1987), P. IX—X III.

② T. K.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971), P. 399—414.

③ Charles Tilly: "Family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JFH, 12(1987), P. 319—330.

④ T. K.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1, February, 1991, P. 97.

法国的人口与社会史派,英国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学派为代表,前者以拉杜里为首,后者以拉斯勒特为首。<sup>①</sup>人口学派利用教区登记、人口统计材料,试图重建过去的家庭模式,并反对传统社会学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前工业化时代,婚姻年龄要比通常认为的高,夫妻也采取一些节育措施,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控制儿童密度的情况,家庭以核心家庭形式为主。拉斯勒特认为,至少从16世纪核心家庭就已经存在下来了。他们不同意工业化导致核心家庭产生的观点,相反,认为工业化后,由于人口向工业中心的流动,对房屋的空间要求增长,多代合居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增加。赫利黑把核心家庭的存在追溯至12世纪。<sup>②</sup>史密斯通过对索福克人头税登记表(1377—1381)的分析认为,这个地区的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差别不大。<sup>③</sup>

60年代以来的历史人口学派利用先进的统计手段,处理了大量的涉及人口的资料,但是,这种重量化与结构的分析而忽视性质的分析方法存在着很多缺陷,妨碍了对家庭几百年来本质变化的把握。首先,在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没有从根本上区分家(family)与户(household)的不同。核心家庭与核心家户并非完全一致,在同一户下也许包括了很多非家庭关系的成员的居住,一家也不限于一户,有些家庭成员可能生活于他家之中。大户人家并非就是大家庭,在家庭关系上他们仍是核心的。

其次,他们以地域为单位划分的家庭模式,也受到了批评。拉斯勒特认为西欧家庭模式的特点是,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晚育、夫妻年龄差别小、周期仆人(life cycle servant)有相当的比例并生活于与之没有家庭关系的家户中。南欧和地中海家庭模式则相反,其特点是复杂家庭结构、早婚,核心家庭的形成是大家庭的解体而不是通过婚姻关系的分家立户。然而,克泽和格波分别对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研究却否定了上述看法。<sup>④</sup>

再次,户的规模过去与现在也许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其中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何?家庭成员是否共炊?而单纯统计是很难分析这些内容的。正如历史社会学家梅迪克所说,不考虑社会历史内容而单纯地利用家户划分标准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来自统计那些不能统计的内容。工业无产者的祖母也许象小农的祖母一样生活于同一个家庭之中,但这种表面结构的相似性并非说明二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致,二者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是不一样的。<sup>⑤</sup>

从70年代起,家庭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分析,以区别形同质异的家庭结构。其一是注重个人生活过程的研究;其二是重视家庭与亲属

① E.L.Ladurie: "Family Structures and Inheritance Customs in 16th-Century France", in "Family and Inheritance: 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200—1800", J.Goody, J.Thirsk, E.P.Thompson, ed., Cambridge 1976;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London, 1965; P.Laslett, ed.: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1972.

② David Herlihy: "Medieval Households", Cambridge, Mass., 1985.

③ Richard Smith: "Kin and Neighbors in a 13th-Century Suffolk Community", JFH, 4(1979), P.219—256.

④ David J.Kertzer and Caroline Brettell: "Advances in Italian and Iberian Family History", JFH, 12(1987); Haim Gerber: "Anthropology and Family History: the Ottoman and Turkish Families", JFH, 15(1989), P.417.

⑤ Hans Medick: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Social History", 1—2, October, 1976, P.295.

制度的关系，考察家与户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生命进程”理论 (life-course approach) 与“家庭周期”理论 (Family Cycle) 不同。后者主要以父母为主线，探讨家庭结构的变化。它的缺点是，只把家庭分为父母的形成、生儿育女、寡妇鳏夫的形成直到家庭解体，没有注意到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儿女地位的变化。生命进程理论是由社会学家埃尔德针对上述弱点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它主要探讨家庭成员个人的发展历程，如，何时成为儿童，何时成年，何时结婚，何时做父母，晚年景况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发生了什么变化？<sup>①</sup> 这一理论给家庭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它使对家庭周期的简单观察转到对家庭成员个人发展变化的分析，从而去研究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次变迁的关系。<sup>②</sup> 在今天看来，什么时候成家立业是个人的问题，但在过去却是家庭共同策略的一部分。莫德尔发现，从由家庭需要出发的不规律的个人生命周期到由个人决定与自己的年龄相适应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变化。过去几个世纪的最显著变化是生命周期日益个人化，年轻人是否结婚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找到合适的伴侣和适当的年龄，而不是出于家庭的需要。<sup>③</sup>

即使是核心家庭，它也仍与亲属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又一新观点。核心家庭成员与扩大的亲属关系之间通过互助、联合和各种礼仪而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父母与其子女不再住在一起，他们也仍生活在附近，同住在一块土地上。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在研究家庭与工业化的关系时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

### 三、家庭与工业化

近20多年来，西方家庭史学界的一大变化就是不再把家庭看作是社会变迁的简单结果，而是强调家庭自身变化的动力以及家庭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影响作用，这尤其反映在对家庭与工业化的关系的研究上。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历史的主要内容，也是现代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家庭史学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工业化过程中必然涉及这样的问题：早期工业化的资本如何形成？劳动力市场如何产生？生产过程与生产单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的？西方的较早崛起是否与西方社会制度的特殊性有关系？过去的家庭和亲属制度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认为是近代社会的因素吗？为了探讨这类问题，家庭史研究的视角由“工业化对家庭的影响是什么？”转到“家庭对工业化有什么影响？”<sup>④</sup> 他们主要从两个领域来探讨：一是原始工业化时代的家庭与家庭经济；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

原始工业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 被认为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时代，普遍存在于17到19世纪前工业化时代的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奥地利的乡村及部分城市中。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仍在生产者家中，

① Glen Elder: "Family History and Life Course", in "Transition: The Famil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K. Hareven, ed., New York, 1978.

② T.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Historical Time", "Daedalus", 106(1977), P.57-70.

③ John Modell: "Into One's Own: From Youth to Adult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75", Berkeley, 1989.

④ T.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work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New York, 1982.

依靠非工资劳动者,主要是家庭成员来完成。与传统农民的家庭工副业不同,原始工业是“新式小农”的主业,资本家控制了生产资料并把产品销往海外市场。<sup>①</sup>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在探讨这一经济形态时,着重分析家庭内部的变化和家庭经济的性质,分析它们在西方工业化起源中的地位。鲁道夫·布朗首先在瑞士北部的苏鲁克地区发现这种生产形式,他特别强调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它吸收了妇女和儿童劳动力。<sup>②</sup>此后,门德尔斯、梅迪克、莱文等人逐渐丰富了这一理论模式的内涵,并由门德尔斯正式创立了“原始工业化”这一概念。<sup>③</sup>

他们认为原始工业化时代的家庭仍是核心家庭,但户的规模明显扩大,原因是一大群未成年的子女合居家中。这并非说明家庭更富裕,也不是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而是因为婚龄的提前、高出生率和一种新的年龄流动方式,即孩子不再离家外出做周期仆人,而是留在父母身边做帮手,这都与原始工业化时代家庭特别需要儿童参加劳动有关。但这种家户的扩大并没有形成传统式的主干家庭(Stem family)或多代合居的大家庭结构,相反,由于土地的丧失和市场因素,传统家庭还遭到了破坏。在原始工业化地区,家庭作为财产继承的重要性让位于它作为一个劳动单位的重要性,这不仅减弱了父母对年轻人的婚姻控制,同样也放松了辈份之间的那种因继承关系而形成的家长制式关系。因此,尽管父母们希望孩子留在身边,但他们又缺乏对子女们的约束力,婚姻逐渐脱离了家长的严密控制,也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婚姻也是原始工业化时代工业扩展的手段,因为它导致了一个新的核心家庭单位的形成,这也是一个新的“劳动单位”。梅迪克说,婚姻和新家庭的形成摆脱了原有家庭的控制,它们不再取决于财产关系,然而它们在产生过程中也没有失去其物质基础。这是没有大量的嫁妆和继承财产的伙伴式婚姻,是上流社会所说的只能把两架纺车而不是两张床拼凑在一起的“乞丐婚姻”(Beggars Marrages)。

最近,有人对原始工业化的家庭模式提出了批评,一些人对这一模式的普遍性表示怀疑。但是,原始工业化家庭的理论模式有助于加深对西方工业化过程的理解,加深对家庭变迁在工业化中的地位的认识。原始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者是传统小农向近代工业无产者转变的过渡形态。门德尔斯认为,原始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经济变迁造就了工厂制以前的无产者。莱文认为,圈地运动并没有全部消灭小农,而是它的基础的转变,由依赖土地转向依赖劳动力,在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中日益无产化。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家庭生产方式为工业劳动准备了劳动力,在一些地区,首先进入工厂的就是妇女和儿童,对他们来说只是变动了一下工作场所,一旦进入工厂,他们原来的技艺使之较易适应新的劳动环境。总之,家庭通过提供新式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和组织其成员向工业中心转移而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sup>④</sup>

正如对原始工业化下的家庭的研究一样,对工厂制下的家庭的研究也证明,家庭作为一

① Pete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ed.: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Rudolf Braun: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Canton of Zurich",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P. 289—334.

③ Franklin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1972), P. 241—261; Hans Medick: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David Levine: "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New York, 1977.

④ Sonya O. Rose: "Proto-industry: Women's Work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the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JFH, 13(1988), P. 181—193.

个能动的因素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根据传统的“社会解体”(Social Breakdown)理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导致了人们迁离了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工业化工作和城市生活的压力引起家庭单位的解体,对工业生活的适应剥夺了移居者们的传统文化。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尼尔·斯梅尔塞在他对英国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家庭的开拓性研究中证明,早期的纺织工厂招收整个家庭作为一个工作单位,父亲为他们的子女订立契约,代收他们的工资,有时还在厂里训导他们。家庭以工厂作为其雇主,而工厂以家庭群体维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充。直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一系列工厂立法和技术变革,工人家庭才逐渐失去了经济和培训职能。<sup>①</sup>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哈芮文对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艾莫斯基格工厂的工作和家庭研究也证明了家庭作为一个能动的因素在工业企业中的作用。最适于工厂制度的家庭类型不是“孤立”的核心家庭,而是那些根植于扩大了亲属纽带之中的家庭。在缓冲对工业化工作的适应,而又不过度的限制单个工人的流动性的过程中,亲属关系成为服务于工业雇主的工具;同时又是促进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的利益和向他们提供安全保护的手段。<sup>②</sup>当然,家庭在工厂制度中所采取的主动态度并不能表明家庭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也并不是说工人们及其家庭成功地改变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它只能能动地适应新的环境。

移居城市和进入工厂做工的工人既没有完全放弃从前的家庭传统,也没有严格地恪守之,而是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适应他们所面临的新条件。因此,尽管家庭在适应新的环境中不断地变化,但它并没有与工厂制度的变化同步发生,这是对现代化理论中“线性”(Linean)论的质疑。工厂的现代化并不自动地导致家庭的“现代化”。家庭既是传统的守护者,又是一个变化的动因。作为传统的守护者,家庭给其成员提供一种文化习俗的连续感,使其在面临新的环境时可以依赖于它。<sup>③</sup>

#### 四、家庭策略

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以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成了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

家庭策略指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时机,如什么时候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何时控制家庭规模、实施节育措施等。当代家庭史研究试图利用个人日记、信件等材料去推断人们的家庭行为模式。丹尼尔·史密斯从一个家庭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推断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的节育策略;从同期的婚姻登记和遗嘱推断出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策略。<sup>④</sup>

① Neil Smelser,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New York, 1968, P.34.

② T. K. Hareven: "Dynamics of kin in an Industrial Community", in "Turning Points: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on the Family", John Demos and S. S. Boocock, ed., Chicago, 1973.

③ T. 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P. 116—200.

④ Daniel S. Smith: "Child-Naming Practices, Kinship Ties, and Change On Family Attitudes in Hingham, Massachusetts, 1641-1880",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8(1935), P.541-566; "Parental Power and Marriage Patterns: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Trends in Hingham, Massachusetts", i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5(1973), P.419—428.

有的学者从19世纪晚期人口调查的户口登记中推断妇女参加劳动的家庭策略。<sup>①</sup>

学者们还通过遗嘱文献、口碑材料研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继承策略，如财产的继承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保证财产不分散的长子继承策略等。近年来对家庭策略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文化观念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家庭行为不完全由经济决定，也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如儿童和妇女是否参加劳动、什么样的消费方式都与一定的文化观念有关系。

家庭策略是家庭决策的表现，谁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性作用？各个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家庭策略？考察这类问题可以从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的性质，进而理解家庭对社会的影响。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对东方和西方的家庭研究中普遍注意到家庭决策决不仅仅是一种相互商量和民主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充满着夫妻争执和父母与子女的争论。<sup>②</sup>如在19世纪的“家长制”式的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家庭生存的经济支柱，他在关于迁移、家庭成员工作经历这类问题上有较大的决策权，但在节育、家庭开支这类问题上妻子仍有较大的发言权。至于孩子在家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家庭由传统型向近现代型的转变中，儿童中心趋势很显著，儿童不完全唯父母命是从。

家庭策略加深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家庭不是被动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作出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是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合力，合力的方向或家庭策略的取向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家庭的性质又必然影响社会的变迁。由此可见，从家庭史的角度探讨社会变迁的原因与方向是可行的。

## 五、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

当代西方家庭史学领域仍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1. 家庭和社会变迁到底是什么关系？既然家庭变化不是工业化的结果，那么它们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呢？2. 近现代家庭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对这类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劳伦斯·斯通为代表，继承法国学者菲力浦·阿芮斯的研究方法而持传统的观点。1960年阿芮斯的著作《儿童的时代》发表，被认为是家庭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sup>③</sup>阿芮斯认为，“儿童时代”只能出现于17世纪，这是与夫妻制式家庭的出现一致的。在这种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已超越了家族亲属关系，但在近代之前的英法，家庭实际上与较大的共同体生活交织在一起，亲戚、食客、朋友、仆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小家庭的空间，而近代家庭却以父母子女关系的亲密化和家庭的隐私化为特征。<sup>④</sup>劳伦斯·斯通根据对上流社会的研究仍持这种观点。他在《英格兰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一书中，重建300年间英国家庭变化的模式，认为其间最大的变化是从“开放的家族”（Open-Lineage）到和谐的核心家庭，这种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同居单位、也是一个以情感纽带和感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单位。核心家庭的

（下转第96页）

① Theodore Hershberg, ed.: "Philadelphia: Work, space, Family, and Group Experience in the 19th-Century", New York, 1981, P.277—310.

② T. 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③ T. K.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④ Philippe Arie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Robert Badick, trans., New York, 1962.

度的人也不是，恐怕是无向度的人。向度的概念，实际上是数学上的维，统计学上的自由度。作为单向度的人，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自由活动，按当前社会的品味去争取成功，劲头大的多些成功，懒散的少些成功。但是没有向度的人们，连懒散都没有了，到了该生孩子时就都得拼命去生。

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仍属于发展的第一阶段（原始阶段），生殖繁衍是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无可选择的生活目的，或说是他们对生命周期做出的必然反应。如果想改变或限制这种行为方式，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只能是不符合这一文化逻辑的行政手段，而中国农民生育观念的真正改变，则有赖于脱离农村的家本位环境，进入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营造的个人本位生活环境。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前景不会像建国后的头三十年那样显得遥遥无期。近十年的情况使人们对这一前景重新萌生了希望。

其他参考书目：

《田雪原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大渊宽、森冈仁：《经济人口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薄兹、施尔曼：《社会与生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哈迪：《情爱·结婚·离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责任编辑：谭 深

---

（上接第103页）

出现与社会变迁是一致的，即亲属关系作为社会组织法则转变为近代国家政治取代家庭功能，家庭忠诚转变为爱国精神和统一的主权。<sup>①</sup>他们把近代家庭的起源放于17到19世纪，即近代社会的形成时期。<sup>②</sup>以拉斯勒特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则持与之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两种学术传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把前者重性质、情感的分析方法和后者重结构、计量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把前者重上层家庭的分析与后者重下层大众家庭的分析结合起来，那么家庭史的研究必定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们从当代西方家庭史学重模式不重实质的考察方式看，这种分歧仍将持续下去，他们甚至也无意探讨规律性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W·古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在社会科学中几乎一切有关家庭的问题都包括两大类：1.在或短或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家庭模式（如离婚率的升高、新居制的兴起）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会变化？2.在这类变革中有没有规律可循？”他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而第二个问题“迄今为止，这仍是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问题。”<sup>③</sup>在这里我们感到，当代西方家庭史学领域就象当代西方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弥漫着一种历史“非决定”论思潮。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责任编辑：谭 深

---

① Lawrence Ston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1977.

② Edward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1976.

③ W·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235页。